



高级中学课本 拓展型课程教材

高中历史

高中三年级（试验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级中学课本 拓展型课程教材

高中历史

高中三年级(试验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说 明

本册教材根据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改革委员会制定的课程方案和《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试行稿)》编写,供高中三年级试验用。

本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主持编写,经上海市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准予试验用。

主编:余伟民

特约撰稿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令愉 方 平 李蓓蓓 沐 涛 张耕华

陈 江 金志霖 孟钟捷 郭海良 瞿 骏

欢迎广大师生来电来函指出教材中的差错和不足,提出宝贵意见。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地址:上海市陕西北路 500 号(邮政编码 200041),联系电话:62560016(总机转)、52136338;出版社电话:62572474。

声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中,关于“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的有关规定,我们已尽量寻找原作者支付报酬。原作者如有关于支付报酬事宜可及时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1

- 第1课 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2
- 第2课 宋明理学……7
- 第3课 家族制度与君主政治……12
- 第4课 礼制规范……17
- 第5课 儒家文化的传播……22

第二单元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27

- 第6课 思想潮流的演进……28
- 第7课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33
- 第8课 新式教育的发端……38
- 第9课 科技与文化的发展……43
- 第10课 社会生活的变迁……48

第三单元 先进思想理论与现代中国……53

- 第11课 孙中山三民主义……54
- 第12课 毛泽东思想……59
- 第13课 邓小平理论……64
- 第14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69

第四单元 上海历史的变迁……74

- 第15课 开埠之前的上海……75
- 第16课 近代上海市政的变迁……79
- 第17课 近代上海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83
- 第18课 近代上海文化的发展……88
- 第19课 发展中的新上海……93

第五单元 中国史学的发展……98

- 第20课 古代的史家与史籍……99



第 21 课 史学的转型……103
第 22 课 现代史学名家……107

第六单元 古代世界的帝国……111

第 23 课 波斯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112
第 24 课 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117
第 25 课 阿拉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122

第七单元 世界三大宗教……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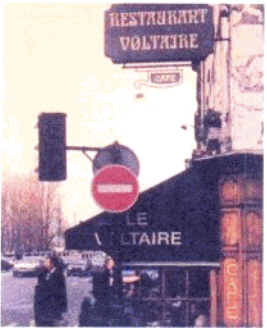
第 26 课 佛教……129
第 27 课 基督教(上)……134
第 28 课 基督教(下)……139
第 29 课 伊斯兰教……144

第八单元 17—18 世纪的启蒙思想……149

第 30 课 17 世纪英国的启蒙思想……150
第 31 课 18 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155
第 32 课 启蒙思想的传播……161

第九单元 现代化的世界进程……165

第 33 课 现代化在英国的启动……166
第 34 课 现代化在欧洲的扩展……171
第 35 课 现代化在北美、东亚的扩展……177
第 36 课 20 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整与改革……182
第 37 课 苏联现代化道路的探索……187
第 38 课 发展中的新兴大国……193



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儒家学说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针对礼崩乐坏的春秋乱局，以重振礼乐制度为己任，希望通过仁爱的方式恢复宗法制度下的身份等级秩序。汉代儒士兼采阴阳五行学说，为儒家的伦理纲常敷上浓郁的神学色彩。宋明理学家则将儒学提升至哲学的高度，使之更为精致而周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与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相辅相成的理论体系，在家族制度与君主政治长期延续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对古代中国的社会观念、行为规范、政治思想、法律制度等都具有极为深刻的影响。儒学还辐射东亚，形成“儒家文化圈”，并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



第1课

先秦儒家与两汉经学

孔孟之道

儒家是在乱世求治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学术思想流派。春秋时期,社会处在变革、转型阶段,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①针对礼崩乐坏、动荡纷争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救世的主张。他认为必须重建周礼的权威,遵循宗法制度的原则,以“礼”的规范约束人们的一切言行,使社会成员安分守己,恪守传统的等级秩序,才能消除人欲横流、名分紊乱的时弊。



传为马远所绘的孔子画像

儒家学说中的“礼”,虽表现形式极其丰富,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但实质是一种特定的行为规范。西周实行严格的宗法制度,所有社会成员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处在上下有别的社会等级中。依据宗法原则确立的“礼”,则从各个方面细致入微地限定了每个人的地位、责任和义务。孔子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就在于人们不守本分,出于私欲而争权夺利。他强调为政必先“正名”,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意图就在于辨正礼制等级的名称和名分,使人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严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如果人人都能安分守己,循礼而行,便可消弭动乱和争斗。

“复礼”的关键在于“为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并解释说“仁”就是“爱人”,尤其是爱自己的亲人。为“仁”之本应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入手,首先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若能形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的状态,便能恢复礼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孔子学说的一大特色是以“仁”释“礼”。弟子颜渊曾向他请教“仁”是什么,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又请教“仁”的具体行为是什么,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显然,孔子认为能克制自己,使所有言行都合乎礼,就是仁。不过,孔子并不将礼制规范强加于人,他要求人们以血

^①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缘亲情为基点,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出发,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由近而远,以此建构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经孔子这样一番诠释,外在的等级制度和社会规范被转化为人们内在的道德意识和自觉要求。所以说,孔子的“仁学”是其学说中最为精妙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提出的道德要求并非是单向的,他在强调臣下忠顺、子弟孝敬的同时,也要求君主仁义、父兄慈爱。这正是儒家伦理学说的基本精神。

孔子还以“义”作为判断所有事物的价值标准,人们的言行举止符合“礼”的规范和“仁”的精神,就是“义”。正人君子应重义轻利。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是孟子和荀子。孟子^①认为人性本善,而这正是儒家道德准则仁、义、礼、智的基础与开端。他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并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为“仁政”学说,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结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由孔子创立,孟子继承、发展的儒家学说,后人习称“孔孟之道”。

孟子称看见儿童将落入井中,人人都有恻隐之心,都会震惊痛惜,由此推论,人性本善。齐宣王企图用武力兼并他国,以霸道称雄诸侯,孟子劝他施仁政,行王道。宣王诧异,问:“像我这种欲海无边的人也能行王道吗?”孟子说:“能!”宣王问:“你从何得知?”孟子回答:“听人说,某次王坐在殿堂之上,见有人牵一牛从堂下经过,王问:‘牵牛干吗?’那人说:‘杀牲取血祭钟。’王说:‘放了它!我不忍心看它惊恐颤栗的样子,就像无罪之人被押赴刑场。’有无此事?”宣王说:“确有此事。”孟子说:“这就是王的恻隐之心,凭藉此心足以施仁政,行王道。”孟子在阐述民本思想的同时,也提出一些具体方案,如要求君主轻刑薄税、给民恒产、听政于民、与民同乐等。虽然孟子的学说在霸道盛行的战国未受重视,但在后世备受仁人志士的推崇,也打动过不少开明君主的心。

荀子则从“性恶论”出发,更注重外在的社会规范和刑罚制度对人的制约作用,政治上主

文献选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孟子庙

文献选读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公孙丑上》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梁惠王上》

^①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

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荀子的思想在后世也有不小影响。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就是说人性本恶，所有善行，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因此，他强化了孔子的“礼治”观念，并融入法家思想，特别注重人们的等级差别以及外在的制度、规范对“人欲”的抑制作用。荀子称：“礼义者，治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又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可见其本人仅折中儒、法，未侧重任何一家。但究其基本立场，确实更接近“尊君”而非“贵民”，故与孟子迥异。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皆成为法家的代表，便说明了这一点。

儒学的经学化

汉初以来，一度沉寂的儒学渐受重视。汉武帝继位后，锐意进取，经营开拓，需要积极有为的思想学说为其治国安邦提供理论依据，这成为儒学地位迅速上升的契机。

汉儒大家首推董仲舒^①，他兼采阴阳五行学说，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系统提出“天人感应”之说。政治上倡导“君权神授”，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天子受命于天，秉承天意治理人世，所以臣民必须服从天子；同时，天又对天子进行监督考察，通过祥瑞和灾异予以褒奖或谴责。伦理上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认为君臣、父子、夫妻的等级差别出于天的安排，并将仁、义、礼、智、信视作为人处世永恒的道德准则。后人习称“三纲五常”。

名家史论

（董仲舒的）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既为行使皇权提供根据，又对行使皇权有所限制。皇帝必须注视天的喜怒表现，依照它来行事。汉朝的皇帝，以及以后各朝皇帝也或多或少地是一样，就是用这一点检验他自己和他的政策，一旦出现灾异使之不安的时候，就试图改正。……一个皇家，无论多么好，其统治时间是有限的。终点一到，它就得让位给新朝，新朝的创建者又是受新命于天的。儒家就是用这样的一些措施，试图对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约束。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董仲舒画像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说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神圣化、绝对化，实际上是在严格的宗法制度已不复存在的社会背景下，为儒家的道德准则重新奠定基石。人们恪守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不仅出于血缘亲情，更是遵从“天意安排”。尽管董仲舒对先秦儒学做了新的诠释与阐述，但并未悖离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他提出的“君权神授”说，在告诫臣民必须服从君主的同时，又强调君主必须服从天意。君主若顺天行事，修饬德政，体恤百姓，上天会降下祥瑞，予以赞许和庇佑，反之，则会遭到天降灾异的谴责，仍不思悔改，上天就会收回符命，使之败亡。这无疑是对君权的一种警戒和制约。

^① 董仲舒（前 179—前 104），广川（治今河北景县西南）人。著作丰富，今存《春秋繁露》。

文献选读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应诏先后三次向武帝上策建言，阐述自己的理论，并顺应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大一统”的主张，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他的建议被武帝采纳并实行。

董仲舒等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只是从思想大一统的政治目的出发，使儒学取得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以此“一统纪”、“明法度”，本意并不想禁绝其他诸子百家。汉武帝采纳这一建议后，也只是大大提高了儒学在官学和朝廷中的地位，并不禁止其他学派的流传。就武帝及其后继者的统治思想而言，也是杂采诸家，“儒表法里”。汉宣帝曾公然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实际上，武帝之后的诸帝，在尊崇儒学的同时，始终能“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汉代文化的昌盛，实与这一开明的文化政策相关。

此后，儒学在各家学说中获得“独尊”地位，成为统治者极力推崇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典籍被称为“经”，解释和阐发儒家经典成为专门的学问，称为“经学”。武帝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设立五经博士，专事儒经的研究与传授。后又在长安兴办太学，教授五经，入学者完成学业经考试合格，即可担任官职。郡县也建立地方学校，配有经师授学，以培养官吏的后备人选。由于经学的研习、传授为学者的入仕开辟了通途，因此通经致用成为文人学士的普遍追求。汉代以来，儒学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和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广泛而深远。



汉代画像石《传经图》描绘了汉代儒生传授经学的情景

知识链接

先秦时期,不仅儒家典籍,其他各家著作,都可称为“经”。西汉武帝以后,儒学“独尊”,地位在其他诸子百家之上,“经”自此成为儒家典籍的特称。

“经”的内容,起初仅限于“六经”,即《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春秋经》。但汉武帝时,《乐经》已经亡佚,所以当时仅立五经博士。东汉时曾增加《孝经》和《论语》,合称“七经”。至唐代,《礼经》一分为三,析为《仪礼》、《周礼》、《礼记》三书;三部解释《春秋经》的“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也升格为“经”。于是,加上原先的《诗经》、《书经》、《易经》,合称“九经”。宋代以来,“九经”之外又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合称“十三经”。

解释、阐发儒家经典的“经学”始兴于西汉武帝时,在其后的发展中,经学内部又分化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大学派别,争论千年而不息。以汉代隶书写定的版本为研究依据的称“今文经学”,以先秦古文写成的版本为研究依据的称“古文经学”。两派在治学宗旨、观点方法上也存在重大分歧。

练习与思考

1. “道德与功利,何者为重”,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即所谓的“义利之辨”。孔子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与利相对立,认为获得功利的行为未必道德,故反对“不义而富且贵”,主张以义节制人们的逐利行为。儒家学者多持这种“重义轻利”的观点。法家则相反,如韩非就十分注重功利,认为人与人之间首先是利害关系,有利才有义。他称:“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所以“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后世学者也有主张义利统一、义利并重的。如清代颜元称:“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对上述不同的义利观,你赞成哪一种说法?为什么?

2. 孔子的“仁学”与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分别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二者有何不同?

延伸阅读

1. 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2. 冯天瑜等编著:《中国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2课

宋明理学

程朱理学

唐代中期以来,儒学的研习、传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延续近千年的经学体系既不符合时代的认识水平,也不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儒家极力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以及相应的伦理纲常遭到巨大冲击。为此,有学者大声疾呼:复兴儒学,直接继承孔孟“道统”。

儒学的困境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经历了“中国化”的佛教与融入部分儒学伦理的道教,已有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传播;“三教合一”、“三教并行”的现状开始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构成威胁。其二,在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发生巨大变化,神学色彩浓郁的“天人感应”说不再盛行的情况下,粗疏而僵化的传统经学既不能令人信服,也难与佛、道对抗,更无法解答一系列现实问题。其脱胎换骨势在必行。因此,从儒学原著中继承孔孟“道统”,重振传统的伦理纲常,成为宋代理学的发端和贯穿始终的治学路径。

自宋初开始,众多儒家学者致力于儒学经典的重新诠释。他们在排拒佛、道的同时,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就宇宙本原^①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建一个以“理”为核心的更加精致完备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在构建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贡献最突出的有程颢、程颐和朱熹。

宋代理学家虽以抨击佛、道为己任,但又不得不汲取大量佛、道思想。原因在于,“入世”的儒学以解

知识链接

宋代“理学”在历史上又有“新儒学”、“道学”、“宋学”等名称。所以称为“理学”,是因为两宋儒家学者所创建的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原,以“理”为其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所以称为“新儒学”,是因为理学虽以儒家的礼治思想和伦理学说为核心,但其继承的孔孟之道已被融入大量的佛、道思想精粹,经过这番改造的儒学呈现焕然一新的面貌。所以称为“道学”,是因为宋代理学家自认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并宣称他们的学问以“明道”为目标。所以称为“宋学”,是因为清代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考据学家推尊汉代经学家,批评宋代理学家治学空疏,故以“汉学”与“宋学”对称。细加辨析,上述名称在指称时的侧重点和概念范围是稍有不同的,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习称理学为新儒学、道学或宋学。

^① “本原”是哲学名词,所谓“宇宙本原”是指宇宙间万事万物产生、存在和发展演变的最根本的原因与依据。对宇宙本原的探讨是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历史上的中外哲学家曾就此展开广泛的论述和激烈的争辩。有的认为宇宙本原是物质实体,有的认为宇宙本原是精神实体或某种抽象法则。

答现实的伦理、政治问题见长,而佛、道则善于讨论深奥玄虚的哲学问题,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儒学明显处于下风。理学家必须吸收佛、道的思想成果,对儒学加以创新改造,才能在更为概括、更为抽象的理论高度与佛、道进行论辩、对抗。所以,宋明理学家包括程、朱、陆、王等人多精通佛、道之学。后人形容理学为“儒表佛里”之学,可谓一语中的。

北宋中期的程颢、程颐^①兄弟合称“二程”,他们明确提出哲学意义上的“天理”观念^②,认为天理是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宇宙本原,先有理而后有物。“二程”还将天理与礼治秩序和伦理纲常直接联系,称:“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理学在北宋前期经历了一个草创、奠基的过程,不少学者为理学的初具规模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直至“二程”兄弟提出“天理”观念,理学方告正式形成。程颢明确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自“二程”发明“天理”,再经朱熹的一番发扬,作为宇宙本原的“理”成为一种永恒、无限、普遍、必然的存在。人们称新儒学为“理学”,确实很有道理。



朱熹画像

南宋的朱熹^③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发扬“二程”之学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诸家之说,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的核心是天理论,而关键仍落实到天理与人伦的沟通。他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就是其具体体现:“天理流行,触处皆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他指出人性本似明珠,与天理一致,但为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要“明天理,灭人欲”。

理学家讨论宇宙本原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毫无例外,都紧紧围绕伦理道德这一基点,其旨趣无非是论证儒家伦常的永恒、合理、至善。不过,他们的理论阐述确实较先秦儒学和两汉经学严密、精致得多。同样是劝导世人遵守礼制秩序和伦理纲常,孔子凭借的是宗法关系下的血缘亲情,虽然真切朴实,却过于具体简单,一旦社会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情感的纽带就会日渐脆弱。董仲舒依据的“天”是神圣化的有意志的万物主宰,虽可令人因敬畏而顺从,但一旦信仰基础发生动摇,其约束力也会骤然下降。理学家提出的“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是万事万物的总法则,“天理”与儒家伦理纲常的联结,所唤起的是建立在人们高度的理性认识和道德意识基础上的出自内心的自觉性

①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二程”兄弟都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说被称为“洛学”。

② 在二程、朱熹的阐发和论述中,“天理”既是构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基础与根源,又是万事万物运行、变化的最高法则与规律。但他们讨论这一玄虚问题的真正用意是想将儒家的伦理纲常与天理相联系,希望人们自觉践行儒家的道德准则。所以,他们往往直接指出,天理就是伦理道德。

③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因侨寓建阳(今属福建)讲学,其学说被称为“闽学”。

为,显然,这样的基础是比较稳固而可靠的。所以说,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新儒学确实已达到儒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朱熹曾在此讲学,并以此作为研讨、传布理学的中心。

“二程”和朱熹都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力图将外在的社会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追求。为此,他们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和“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要求人们通过一步步的体验、领悟,逐渐达到道德与天理一体的最高境界。

文献选读

《观书有感》二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朱熹

在“二程”、朱熹的学说中,“正心诚意”与“格物致知”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人问:“修身方式,何者为先?”程颐回答:“莫先于正心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并解释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可见,“格物致知”就是通过对天下万物的深刻探究,以穷尽其中的“理”,进而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这一过程应该是逐步递进的,所以程颐称:“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对此,朱熹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先圣教育初学者,必定要求他们对于天下万物,都要依据已知之理,再不断进行穷尽式的探索,以达到认识的极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修身达到这一最高境界,自然就成为能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

“二程”、朱熹的学说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居于正统地位的官方哲学和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工具,世人习称“程朱理学”。

陆王心学

与朱熹同时的南宋理学家陆九渊^①在程朱理学之外,异军突起,别开一派。就为学宗旨而言,陆九渊与其他理学家并无差别,都是通过对宇宙本原的探讨,以论证儒家伦理的永恒与至善。朱、陆的根本分歧在于修身方法,即通过何种途径去完成个人的道德修养。陆九渊

^①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人称象山先生,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

认为程、朱“格物致知”的渐进方式过于支离繁琐,既然天理存于人心,远不如直求本心更为简易便捷。因此,他提出心理合一的观点,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①。道德修养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即可获得天理。

陆九渊基于“心即理”的思想,认为唯有“切己自反”的简易功夫“可大可久”,强调为学的关键在于通过内心的体认、省察去“剥落心蔽”、“发明本心”。显然,这与佛教禅宗直指本心的“顿悟”方法是相通的。朱、陆之争初起之时,双方的好友吕祖谦于1175年邀请他们同往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聚会讲学,希望以此平息争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不料,经过数日的辩论,朱熹和陆九渊更加明确了双方的分歧,自此在学术上分道扬镳,形成对立的两派。不过,思想上的分歧并未妨碍朱熹与陆九渊的友情。六年后,陆九渊前往庐山白鹿洞书院拜访朱熹,朱熹请他登堂升席开讲,亲率弟子聆听,并大加赞赏,由此成为学术史的一段佳话。



清代画家上官周所绘《晚笑堂画传》中的陆九渊画像



王守仁画像

明代理学家王守仁^②与陆九渊一脉相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心即理”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心”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实际上已被视为宇宙最高本原,所以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王守仁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他解释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隐,此便是良知。”由此推断,良知是人先天固有的善性,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但良知常被私欲所侵蚀,故须去除人欲,恢复良知。王守仁的学说在明代中后期曾十分流行。

明代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王朝统治风雨飘摇,陷入重重危机。王守仁认为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世人的道德沦丧,故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他早年曾醉心于程朱理学,遵循“格物致知”的为学路径,但一无所获。于是,又精心钻研佛、道之学。最终,幡然感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自此改从陆九渊的“心学”。他的思想与佛教禅宗的关系更为密切,“心外无物”之说,显然就是“心外无佛,即心是佛”的翻版。王守仁的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心学”特点。

① 陆九渊所说的“心”,既是有知觉作用的思维器官,又是伦理道德的实体。他将心视为宇宙万物的根源,声称“心即理”,其实质是强调天理就在人的内心。因此,注重外在事物的“格物致知”是多余的,只要“发明本心”,认识事物、判断是非的知觉能力和遵从儒家伦理纲常的实践能力,就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并表现出来。

②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人称阳明先生,余姚(今属浙江)人。

由于陆九渊和王守仁都高度重视“心”的作用，世人习称这一学派为“陆王心学”。

宋明理学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影响是，在新的哲学基础上重建了传统的礼治秩序。它在人伦关系中强制注入以“理”为依据的尊卑名分，使“礼”的权威性和普遍必然性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确认。其“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无疑是对个体独立、自由的严重束缚。在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明清时代，其负面作用尤为明显。不过，宋明理学努力在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树理想的人格，也不乏积极意义，中华民族塑成独特的文化性格——重气节、重道德、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显然受到宋明理学的深远影响。

名家史论

佛学之影响于宋学，其时最久，而其力亦最伟。吾人谓无佛学即无宋学，决非虚诞之论。宋学之所号召者曰儒学，而其所以号召者实为佛学；要言之，宋学者，儒表佛里之学而已。盖原始之儒家，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有仁义中和之谈，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及至宋代之理学，始进而讨论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儒家之特色为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而理学之特色则为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哲学的；二者殊不相同。至理学之所以异于儒家者，则完全受佛学之刺激与影响。

——周予同《朱熹》

练习与思考

1. 朱熹以博学著称，平生著述极为丰硕，诗文也很有特色。其《观书有感》二首脍炙人口，流传广泛。请朗读二诗，品味、赏析诗中的意境，并结合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谈谈其中的哲理。
2.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的两大学派，这两派对宇宙本原的探究有何不同？

延伸阅读

姚瀛艇等编写：《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3课

家族制度与君主政治

家族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家国同构”，即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通性，家长与家族成员之间，君主与臣僚百姓之间，都存在森严的等级差别。国可视为家的扩展，家就像是国的缩影。其根源在于长期遗存的血缘纽带对人们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

文献选读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措通措，意为施行）。

——《周易·序卦》

先秦古籍《周易》言简意赅地揭示出“家国同构”的特征。

中国的国家是在氏族社会血缘纽带未完全解体，家庭组织大量留存的情况下起源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夏、商、周建国后，原先的姒姓、子姓、姬姓大家族仍完整保留。西周的宗法制度及其“家国同构”的特征即渊源于此。

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石的父系家族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这是由同一位男性祖先的若干代子孙汇集聚居，按照一定规范，以血缘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其形成、发展和演变与传统农业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核心是家族制度。古代五种主要的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所谓的“五伦”，多为家族亲缘关系，其余都可由亲缘关系推出。传统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也都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

学术界习称中国传统的家族为“父家长制大家庭”，其基本特点是：家长为男性长辈；公共职务和私有财产的继承，严格遵守父系单系世系的原则。中国古代的家族关系是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起点与基石；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都可从家族伦理推行出来。孝敬父母是家族伦理的首要准则，而由孝亲完全可以顺推为忠君。这种由内及外的过程，《孝经》中说得明白：“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由于“家国同构”，齐家与治国也可相互为用，《礼记·大学》即称：“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居中的对联典型体现了传统的家族伦理和社会伦理